

语言与思想文化专集

二十世纪英美哲学中“语言的转向”

陈友和

存在历史的转向与语言学的转向

孙周兴

语言学转向与西方文学的“范式转换”

章国锋

语言学转向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王岳川

思想

思想文综 NO. 1 THINKING

——小札：汉语言的能说与应说

张志扬

方法或者真理

余虹

逻各斯：“语言”与“圣言”

博凡

存在与语言——海德格尔语言思想初探

张汝伦

后形而上思维的主题

哈贝马斯

思想 文综 No. 1
语言与思想文化专集

思想文综编委会
暨南大学比较诗学与
比较文化研究中心

暨南大学出版社

粤新登字 13 号

· 思想文综 · (第一辑)

语言与思想文化专集

思想文综编委会
暨南大学比较诗学与
比较文化研究中心

*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州 石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农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4 万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81029—410—5

I·74

定价: 15.00 元

借鉴、思考、探索（代序）

饶芃子

十多年来，西方文论引介很多，人们由此而引起的思考也十分丰富。如何从中寻找出一个思想的“联结点”，将十多年来西方文论的引介和我们自身对文学批评、文艺理论的思考联系起来，作为我们探索问题的切入点，这是我们近年来一直在追寻的。在这一追寻中，我们注意到“语言学转向与文学批评”问题。

“语言学转向”是20世纪西方人文科学领域的重大事件，它在根本上改变了西方哲学思想的传统路数，进而影响到人文科学的其他领域。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在其实质上乃是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换，哲学关注的基本对象由主客关系或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转向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问题成为最基本的哲学问题。由此，现代语言哲学和现代语言学也成了其他人文学科的基础性理论。所谓文学批评的“语言学转向”就是在此背景上发生的。

一般来说，人们已对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作了较为深入的反思和清理，心理学、人类学等领域的“语言学转向”也备受关注，相比之下，文学批评方面的“语言学转向”却未得到充分的注意和反思。

现代文学批评的立足点转向语言之思并非偶然，它是整个现代哲学反形而上学倾向在文学批评理论上的表现。西方哲学从古

希腊到现代，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古希腊开始的本体论研究，它主要回答存在是什么的问题；第二阶段是发生在17世纪以后的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它主要探究我们能知道什么的问题；第三阶段是本世纪初开始的语言学转向，它着重研究的是要表达什么的问题。“语言学转向”的实质就是要改变传统的“镜式语言观”，反西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和认识论，而西方文学批评的“语言学转向”也是立足于此。

十分显然，西方的“语言学转向”有自己的学术针对性，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去研究这样一个问题：西方的“语言学转向”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意味着什么？在世界文化史上，两种文化的“汇合”，往往有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授——受双方的“认同”，决不是靠一方完全失去原有的“自我”来实现，“认同”不是一方对一方的“淹没”和“定夺”，当中必有“过滤”，也不排除误解和变形，有的甚至就是在误解中“认同”。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澄清事实本身是十分重要的，仅就文学批评而言，就有下列几个问题需要我们去回答：第一，中国文学批评是否也有一个“语言学转向”的问题？如有，是怎样发生的？第二，文学批评领域里的“语言学转向”呈现出什么样的景观？第三，文学批评在“语言学转向”之后有哪些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面对？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做大量的清理和研究工作，不能简单引用西方的事实来作答和作价值判断。

西方的“语言学转向”是在历时性的动态中发生的，有因有果，有过去和现在，也就是说，有它的缘由和必然性。在中国，“语言学转向”的针对性并不那么明确，主要是受西方的影响。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近十几年的事，所以在西方本来是历时态出现的各种思潮、理论，却在这一时期内共时态地涌入中国，因而我们面对的，就不仅仅是现代发生在西方的“语言学转向”问题，

还要面对在这之前西方出现过的各种思潮和理论，拿文学批评来说，就有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社会政治批评，还有心理批评、原型批评，也有与“语言学转向”密切相关注重倾听语言、突出语言、语义、注重语言差异的结构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如何面对文学批评上这种多元并存的现象？如何去解决在西方文化影响下文学批评领域内存在的许多冲突和矛盾？如何去探索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化之“道”？就是一些十分现实而又重要的问题。

后现代文学语言是对传统语言和逻辑语言的反思、解构和颠覆。但中国的汉语与英语不同，汉语言的符号系统：言——意——象三位一体，有意象表达的优势。意和象的结合，形成了汉语言文字的特色。因此，中国古汉语逻辑化的特点并不明显，它以意象性为基础，更长于具体、象征和描述。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意象性批评也很突出。“五四”以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向，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借鉴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出现的，是文化、思想的“转向”，故现代汉语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看作是“西化”的语言，是被逻辑化了的，它的某些方面也是西方后现代文学语言要颠覆的对象。所以，我们在谈论中国的“语言学转向”时，就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的思路 and 理论，应看到汉语与英语的不同，还要看到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区别，只有弄清楚这些差异和区别，才能找到我们自身思想的立足点。

1995年6月8日于暨南园

目 录

1/借鉴、思考、探索（代序）

饶芃子

1/“语言学的转向”

盛 宁

18/二十世纪英美哲学中“语言的转向”

徐友渔

34/存在历史的转向与语言学的转向

孙周兴

49/存在与语言——海德格尔语言思想初探

张汝伦

68/逻各斯：“语言”与“圣言”

博 凡

101/语言学转向与西方文学的“范式转换”

章国锋

116/方法或者真理——西方现代诗学的语言学转向

余 虹

136/论“主体移心”

王 宾

159/语言学转向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王岳川

174/主体缺席的概念晚餐——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失态管窥

王列生

190/主题还是尾巴——语言学转向与文学批评中的形上性问题

吴兴明

204/小札：汉语言的能说与应说

张志扬

217/汉语·汉语理论·现代汉语诗学

费 勇

229/说“言”

张三夕

237/“世上先有是事”——水浒世界之“是”与“事”

陈家琪

251/语言问题何以对我成为问题——我的初始经验的记忆和描述

萌 萌

264/态度的承诺——语言学转向后的交往价值问题

王鸿生

277/后形而上思维的主题

哈贝马斯

附录

299/思·语·诗——“语言学转向与文学批评”研讨会综述
南文

263/稿约

CONTENTS

Referring, Thinking, Exploring	<i>Rao Pengzi</i> (1)
" Linguistic Turn"	<i>Sheng Ning</i> (1)
" Linguistic Turn" in Anglo—American Philosophy of 20th Century	<i>Xu Youyu</i> (18)
Turn in the History of Being and Linguistic Turn	<i>Sun Zhouxing</i> (34)
Being and Language—On Heidegger's Thought about Language	<i>Zhang Rulun</i> (49)
Logos;" Language" and" Word"	<i>Bo Fan</i> (68)
Linguistic Turn and " Turn of Paradigm" in Western Literature	<i>Zhang Guofeng</i> (101)
Method or Truth—Linguistic Turn in Modern Western Poetics	<i>Yu Hong</i> (116)
On " Decentral Subject"	<i>Wang Bin</i> (136)
Linguistic Tu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i>Wang Yuechuan</i> (159)
The Supper of Concepts in the Absence of Subject —The Disorder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i>Wang Liesheng</i> (174)
Theme or Tail—Linguistic Turn and the Metaphysical Question in Literary Criticism	<i>Wu Xingming</i> (190)
What Can Be Said and Should Be Sai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Zhang Zhiyang</i> (204)

Chinese, Theory of Chinese, Poetics of Modern Chinese	<i>Fei Yong</i> (217)
On " Word"	<i>Zhang Sanxi</i> (229)
" Happenings First in the world" ——	
" Being" and " Happenings" in <u>Water Margin's</u>	
World	<i>Chen Jiaqi</i> (237)
Why the Question of Language is a Question	
for Me	<i>Meng Meng</i> (251)
A Promise in Attitude——Questions of Communicative	
Values after Linguistic Turn	<i>Wang Hongsheng</i> (264)
Themes of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	<i>J • Habermas</i> (277)

“语言学的转向”

盛 宁

保罗·利科在《哲学主要趋向》(Main Trends in Philosophy, 1979)一书中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几乎全部的哲学成果,都与过去五六十年间哲学家对于语言发生兴趣的研究有关,“这种对语言的兴趣,是今日哲学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他解释说,对于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已被很多哲学家看作是解决基本哲学问题的必要准备,因为这些传统的哲学问题虽说不是与语言符号有关,而是与事物本身,即人或世界有关,然而,认为在“事物”的理论之前能够并必须先有“语言符号”理论的这种思想,已成为当代西方很多哲学所特有的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内,语言学已经跃居西方人文科学的领导地位,这门科学的高度理论性使它成为任何思考的出发点。而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语言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关于人类现实的符号学的描述模式和说明模式。^①

现在,人们已经习惯地将当代西方哲学的这一走向称为“语言学的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认识的确立基本上是60年代以后的事,这个术语最初由属于早期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古斯塔夫·贝格曼(Gustav Bergmann)提出时,它主要描述的还是本世纪初以来的分析哲学运动。然而现在看来,这一“语言学的转向”标志着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形成的传统语言

观的一个根本改变。倘若传统形而上学将语言视为反映自然的一面镜子,那么,“语言学转向”的结果就是使这面镜子不可回复地破碎了,换句话说,使人们对于作为外部世界的“再现”(representation)的语言永远失去了信任。而这一“语言学的转向”,实际上是分为两步完成的:第一步应该是“语言转向”,它包括分析哲学将传统的哲学问题重新表述为“语言逻辑”的问题,使“语言”取代了传统哲学中“思维”、“意识”以及“经验”所占据的中心位置;也包括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对于“语言”与“存在”的关系的反思。而第二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的转向”,即我们在60年代以后所看到的,语言学的理论模式被作为一种新的认知范式,一种参照体系,对过去的哲学问题和认识重新进行审视。“语言学的转向”似可看作是西方现代哲学的转折点,从此以后的哲学思考则可命名为“后现代”的哲学了。然而,这一转向说来也是一个不长不短的过程,如果从转向最初的起点算起,那么它显然应该包括作为前期准备的分析哲学运动。

西方“现代”哲学的始创者当推笛卡儿和洛克,但真正使哲学与科学最终分家的则是康德,而这一点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确立了哲学的核心是“关于知识的理论”这一认识,从此,哲学将由作为“科学之女皇”的形而上学转变成成了一门“基础学科”(a foundational discipline),它的首要性不再是因为它“最高”,而是因为它“位于根本”(underlying)。这种把“知识”看成是一个问题,认为需要有一种理论来对“知识”进行构想和认识,这是把“知识”看成是“再现汇聚”(assemblage of representations)这一认识的产物。笛卡儿“我思即我在”的提出,确立了“思维主体”(the mind)的哲学概念,西方哲学探索方向随之出现“认识论的转折”(epistemological turn)。在人的认识活动中,人所面对的是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而只有当这个客观物质世界以某种形

式转移到人的思维主体之中，人才可能进行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活动，其实也就是一种“再现活动”。正是这样一种“再现活动”使“知识”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获得知识”（to know）就是确切地“再现”人的大脑以外的世界，而对于知识之所以可能形成和知识之本质的理解，便是对于人的大脑构建这种“再现”之过程的理解。因此我们不妨这样说，哲学是一门将“再现”作为自己首要关注的学科，而这里的“再现”当然是康德所强调的那种“内省再现”（inner representation）。建立在这种“内省再现”基础之上的哲学认识论，于是也就理所当然地把“经验”（experience）作为自己全部探索活动的主旨和内容。

可是，到了19世纪末，以“经验”为中心的哲学则出现了前途危机。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标志的现代生物学的普及，加上为解决认识论问题而新开辟的经验心理学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就使“思维”、“意识”、“经验”等这些传统哲学赖以安身立命的形而上学概念，越来越自然化以致完全失去了它们原先的神秘性。这时，基于“认知经验”而为哲学明确划定的学科界线眼看就要崩塌。但所幸的是，这一危机并没有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进入20世纪的西方哲学家将探索方向转向数理逻辑，很快找到了“语言”作为“经验”的替代物。如果说当年康德以“可能的经验”使哲学第一次成为独立的学科，那么，现在“语言的转向”，则可以说是第二次为哲学确定了统领各门学科的一个学科领域。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指出，“语言”之所以会取代“经验”而占据哲学思考的中心，原因有二：首先，这两个概念都各有很大的包容性——可以覆盖人类探索的全部领域，涉及人类研究的所有课题。其次，在本世纪初，人们仍认为诸如“语言”和“意义”这样一些概念是可能避免自然化过程的。^②

当时的分析哲学选择了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即他在《逻辑

哲学论》中提出的逻辑原子主义观点作为认识模式。但由于维特根斯坦本人后来又放弃了他在此书中的观点，并写出《哲学研究》对自己前期的观点进行批判，因此，对于维特根斯坦这两部非常重要、观点却南北相背的著作究竟怎么看，即使在哲学界内部，长期以来也存在着种种不同的阐释。从现在的后现代哲学视角看，当年罗素对《逻辑哲学论》的评价，认为它所关注的是“一种逻辑上完美的语言所必须符合的条件”，显然与作者自己声明的要“为思想划定一个界限”、“思考无法思考之物”的本意大相径庭，难怪维特根斯坦当年就拒绝了在德文原著上用罗素撰写的这篇前言。美国学者爱伦·塞赫（Allen Thiher）曾颇有见地地指出，《逻辑哲学论》应该说是以传统形而上学的语言观来看待语言，它仍然将语言看成是反映自然的一面镜子，然而，它又是反形而上学的，它不仅让人看到这面镜子已然破碎，而且它试图将破碎的镜片尽量拼合起来，但这种努力最终无济于事，从而让人们明白要想再捍卫这样的一种形而上学只能是徒劳。因此他把《逻辑哲学论》称之为“形而上学的反形而上学著作”，说它是一部理解“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的反面引论”，而且认为在多重意义上，维特根斯坦从《逻辑哲学论》到《哲学研究》的发展，都可看成是一种从“现代”思想方法向“后现代”思想方法的转变。^⑤

对于维特根斯坦本人和他的著作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讨论。而作为整个西方哲学所出现的“语言学的转向”，则正如罗蒂所指出的，是旨在使哲学维持其坐而论道的学科地位的奋力一搏。它试图为知识清晰地划定一个空间，使之不受社会学、历史、艺术以及自然科学的入侵。这一努力旨在为康德所谓的“超验之物”找一个替代，以“意义”来取代“思维”或“经验”，这样就为哲学提供了一种非经验性的内容，就能继续保证哲学的纯粹性和自足

地位。然而，随着语言哲学的崛起，当哲学认识论所探究的重心由“经验”转变为“描述”以后，它便势所必然地要对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提出质疑，甚至予以全面的否定。与过去的实证主义者不同，语言哲学家既不是认为形而上学所讨论的问题超出人的经验，因而人的理性能力不能解决，也不是企图以某种中性的要素取代物质或精神本原，而是干脆宣布传统形而上学所争论的问题，诸如世界的本原、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本质、绝对性等等，都是没有意义的，断言这些根本不应该是哲学所要探讨的问题。他们这么认为的理由是什么呢？逻辑实证主义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艾尔（A. J. Ayer）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哲学的命题不是事实性的，而是具有语言的特点，即是说，它们并不描述哲学对象、甚或思维对象的行为；它们仅表示定义，或定义的形式结果。基于此，我们可以说，哲学是逻辑学的一个部门。

“哲学是逻辑学的一个部门”，此话本出自逻辑实证主义的主将卡尔纳普（R. Carnap）。他们的意思很明确：如果我们不能对一个命题的真实性给予证明，那么我们就不能称这个命题是有意义的。所以，艾尔上述一番话，无异于是对所有的形而上学论者挑战说，如果他们不能对自己的命题证实或证伪，那么逻辑实证论者就有权将形而上学抛在一边而不予理睬。^④

如果说语言哲学向形而上学的挑战仅仅局限于此，仅仅是想用—个逻辑问题将哲学再度纳入实证的范畴，那么，试图以某种对立理论来取代形而上学论的语言哲学家，也就像F·H·布拉德雷所说的那样，充其量仍只能是“形而上学论者的兄弟”。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西方哲学进入20世纪以后，反形而上学的势头

日见其盛。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后期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关于“语言”的思考对当代哲学“语言学转向”的进一步推动，海德格尔的语言观与日渐崛起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的接轨，从而对形而上学所起的消解和颠覆的作用。

但这里却需要先提一笔，理查德·罗蒂为纪念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两人百年诞辰的学术讨论会撰写过一篇很重要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对海德格尔的评价与十年前相比显然有了很大的改变。他把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进行一番比较后提出，前期的维特根斯坦曾希望人们相信：确实存在着一个界定清晰、为人所共享的结构（即语言），而所有的哲学问题原则上都可以通过展示这一结构得到解决。然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当然还有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奎因（W. V. O. Quine）和戴维森（D. Davidson），则与他的前期思想决裂了。年轻时的维特根斯坦因受叔本华的影响而需要一种“神秘性”（the mystical），一种“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有限的整体的感觉”，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则摆脱了他早年的这种叔本华式的自我，不再对“神秘性”感到有一种需要，不再需要让自己与那个“具有不可言说的极限”的世界相对立。罗蒂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生涯则正好与维特根斯坦颠倒了——一个个儿：前期的海德格尔，即在他撰写《存在与时间》那个时候，处处反对将哲学视为系统理论（theoria），他认为这种看法实际上是要高居与生俱来的“畏惧”和“抛入性”之上，以逃避存在的偶然性，他反对将哲学理论看得高于世界和存在，他不愿意高高在上、或超然物外地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有限的整体”。罗蒂认为，如果此时的海德格尔读到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他也会像晚年的维特根斯坦摒弃此书一样将它打发。但有趣的是，后期的海德格尔却又滑回到他曾经竭力保持距离的那种思想之中，回到了他曾竭力拒斥过的那个“有限的整体”，即他所谓